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财务呈报

会计革命

(第3版)

英文版



*Financial Reporting:
An Accounting Revolution
(Third Edition)*

威廉·H·比弗 (William H. Beaver) /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财务呈报

会计革命

(第3版)

威廉·H·比弗 (William H. Beaver) /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财务呈报：会计革命：第 3 版 / 比弗 (Beaver, W. H.) 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ISBN 978-7-300-10132-3

- I. 财…
- II. 比…
- III. 会计报表-研究-英文
- IV. F23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1248 号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财务呈报：会计革命 (第 3 版)
威廉·H·比弗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2.75 插页 2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67 000	定 价	25.00 元

导 读

王立彦 姜国华

一、前言

20 世纪中叶的芝加哥大学无疑是经济学的圣殿，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和自由市场主义的堡垒，产生了如 Milton Friedman, Merton Miller 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同一时期，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科通过其研究成果和学生培养从根本上影响了各个经济学子学科的发展方向。其中，以 Eugene Fama 为代表创立的“有效资本市场理论”为金融学研究开辟了崭新的道路，而 Ray Ball, Philip Brown 和 William Beaver 等则开创了会计学实证研究的新领域，把会计学研究引领到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来。

William Beaver 教授 1965 年从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取得博士学位，1965—1969 年留校任教，1969 年后一直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商学院。他是当代会计学界当之无愧的权威之一，也是当代会计实证研究的缔造者之一。他的《财务呈报：会计革命》（*Financial Reporting: An Accounting Revolution*）一书获选美国会计学会“最佳贡献奖”（Most Notable Contribution to Accounting Literature Award）。1996 年，William Beaver 教授入选“美国会计名人堂”。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美国会计学术界关注的问题更多的是会计体系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点，研究方法多以理论分析为主。这样的争论持续了几十年，但是因为缺乏来自现实经济活动的证据，学术界很难达到比较一致的共识。

1968 年，分别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任教和学习的 William Beaver, Ray Ball 和 Philip Brown 发表了 Beaver (1968) 和 Ball and Brown (1968)。



Ball and Brown (1968) 运用刚刚在芝加哥大学兴起的实证研究方法，研究了股票价格对上市公司盈余披露的反应，发现盈余披露带动了股票价格的变动。也就是说，以盈余为代表的会计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有参考作用。Beaver (1968) 则研究了股票交易量对年度会计报告的反应，发现投资者在年度会计报告披露期间交易活动大幅度增加，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

Ball and Brown (1968) 和 Beaver (1968) 改变了会计学界讨论问题的方式，奠定了会计学实证研究的基础。40 年后的今天，虽然会计学术界更多地把 Ball and Brown (1968) 作为会计实证研究的开山之作，但是我们同样不应该忽视 Beaver (1968) 的开创性贡献。^①

Ball and Brown (1968) 和 Beaver (1968) 之后，会计学者进一步从各个方面，使用各种方法，进一步加强会计信息相关性的研究。在确认了盈余的价值相关性以后，即盈余的披露会带动股票价格的变化后，下一步的问题自然是预测未来盈余。过去的盈余只是预测未来盈余的基础，除此以外，对投资决策没有直接的意义。对于投资者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更早、更准确地预测到即将披露的未来盈余。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会计学界首先研究了盈余的时间序列特征，并在其时间序列特征的基础上预测未来盈余。

很快，会计学者认识到时间序列预测仅仅利用了投资者拥有的很少一部分信息，即盈余信息。除此之外的财务信息没有在预测中发挥作用。从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中期，基于财务报表分析的盈余预测研究（基本面分析）开展起来。基于财务报表分析的盈余预测研究利用了大量的财务报表信息，因此盈余预测准确性大幅提高。

70 年代末期开始，证券分析师行业大规模发展起来。证券公司、投资基金的分析师开始分析大量的上市公司，并对这些公司的未来盈余做出预测。同时，I/B/E/S, Value Line 等机构开始收集和大规模发布证券分析师的盈余预测，所以 80 年代后期，学术界开始研究分析师预测和分析师活动。分析师预测优于时间序列预测和基本面预测，是因为他们在掌握时间序列预测和基本面预测的知识的同时，还拥有其他信息来源，因此可以做出更准确的预测。随着时间的推移，分析师预测成为投资者盈余预期的代表。直到今天，

① 我们认为，Beaver (1968) 之所以没有得到与 Ball and Brown (1968) 同样高度的认可，是因为当时会计学术界对股票交易量的关注，远远小于对股票价格和回报的关注。今天，金融学研究已经把交易量作为资产定价研究的核心要素。会计学同样应该对交易量研究加以跟进，参见 Hong, Harrison and Jeremy Stein (2007)。

分析师研究仍然是会计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盈余预测固然是投资者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但是从盈余预测到投资决策必须经过一个价值评估的过程，投资者要把对未来盈余的预测转变为现在对股票内在价值的评估，然后将评估价值和股票价格对比，并做出投资决策。这个转变过程需要能够有效地将盈余预测转化为评估价值的模型。Ohlson (1995) 创建了基于盈余的剩余收益定价模型 (residual income valuation model)，把会计盈余有效地转化为价值评估。

任何盈余预测模型和价值评估模型效果的好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的科学性，还取决于这些模型使用的“原料”的质量，其中最重要的是过去盈余的质量。企业由于各种各样的动机可能操纵盈余，导致盈余信息失真。如果投资者不能够发现这些失真现象，未来盈余预测和价值评估就不可能准确。因此，会计学研究十分关注盈余管理和盈余操纵问题，通过这些研究，帮助投资者识别虚假信息，提高预测的准确性。

以上回顾的以 William Beaver, Ray Ball 和 Philip Brown 为代表开创的会计学研究对会计准则的制定、对会计行业的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带动会计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信息观 (an information perspective) 逐渐成为一种和传统的计量观 (a measurement perspective) 竞争的观念。会计学发生了一场“革命”。William Beaver 教授是这场革命的代表人物之一，并且用他的力作《财务呈报：会计革命》向我们展示了这场壮阔波澜的革命。

二、重要概念解读

读者要想顺利、清晰地理解本书，首先需要对几个重要的经济学概念有比较好的把握。在这里我们尝试着对这些概念给予简单的解释。

受托责任 (stewardship)

“steward” 直接翻译为中文最基本的意思是“管家”。“管家”受雇于人，受对方委托、为对方打理家庭事务，包括日常生活，甚至家庭财务事项等。“stewardship” 从中演绎而来，代表一方（受托方）为另一方（委托方）管理财产或者财富所承担的责任（受托责任）。在现代，受托责任已经不仅仅针对财富的管理，而且延伸到社会责任领域，比如，我们会说，企业对环境保护负有受托责任。

很显然，受托责任的产生是因为所有权和管理权（或经营权）的分离所导致的代理问题而来的。这当中当然包括我们已经很熟悉的现代企业中经理层对股东的受托责任问题，也包括现代生活中很多其他方面的委托代理问



题。比如，一个家族的财富往往委托若干受托人管理 (trustees)，家族的继承人除了按时从受托人手中领取事先规定好的生活费用外，对受托人如何运作这些财富往往没有发言权。

后一个例子说明现代企业追求的股东财富最大化只是受托责任的一种，受托责任的范围远远不止于此。例如，家族财富受托人的受托责任往往不是如何运作以最大限度地增加这个家族的财富，而是如何能够保值，从而保证这个家族的后代继承人能够享受前辈创造的财富。又例如，一个慈善基金的受托责任也不是使基金规模和市场价值最大化，而是如何按照创始人的意愿把财富有效地捐赠出去。

对受托责任这个概念的理解可以帮助读者理解会计的计量观观念。

完美市场

我们对市场的概念应该已经十分熟悉了，市场是不同的人之间交易各种物品（产品、人力资源、资本等）的场所或虚拟场所。但是，市场的内在定义十分复杂，其中最关键的是市场效率问题。

经济学研究首先假设最简单的市场——完美市场 (a perfect market)，然后研究这个市场的效率。在理解简单市场的基础上，继续增加市场的复杂程度，研究市场效率的变化。完美市场不符合现实生活的实际，却是我们理解市场机制的出发点。

完美市场的基本假设如下：

- (1) 没有交易成本。例如，交易股票不需要向中介机构支付佣金。
- (2) 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是最大化个人效用的。
- (3) 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完全理性的。
- (4) 个人偏好是符合 Savage Law 的。
- (5) 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个人行为不影响商品价格。
- (6) 各个参与者都具有完全信息，不存在信息不对称性。
- (7) 未来具有确定性 (certainty)。
- (8) 各种交易都是双方自愿进行的。
- (9) 没有人能够从交易中取得超额利润。

完全市场

我们假设一个人的（投资）交易期间有三个： $t=0$ ， $t=1$ ， $t=2$ 。在一个完全市场 (a complete market) 上，这个人可以在 $t=0$ 投入 1 单位资本，并在 $t=1$ 收回 1 元钱；也可以在 $t=0$ 投入 1 单位资本，并在 $t=2$ 收回 1 元

钱；还可以在 $t=1$ 投入1单位资本，并在 $t=2$ 收回1元钱。总之，完全市场保证每一笔交易（投资）都是可以实现的。完美市场保证在跨期决策情况下，各期之间的任何交易都存在市场，因此，任何一个 $t=0$ ， $t=1$ ， $t=2$ 之间的交易路线图都可以在 $t=0$ 定价，任何一个复杂的交易都可以用类似于上面数字例子的简单交易组合完成。

完全市场保证任何人不能够跨期套利。

以股票市场为例，很多股票市场（如我国）不允许卖空股票。但是，在有的市场上，投资者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卖空股票，如结合股票指数期货或期权；而有的市场上任何可以组合出一个卖空交易的工具都不存在。我们就说前者比后者是更完全的市场。在完全市场上，我们可以给交易对象正确定价，而不完美市场则使正确定价变得很困难。例如，如果无法通过任何渠道卖空股票，股票价格容易被高估（Miller, 1977）。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个在 $t=0$ 卖出，在 $t=1$ 买入的市场不存在。

不确定性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把风险（risk）和不确定性（uncertainty）混淆。经济学家 Frank Knight 在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一书中对两者做了区别。当我们知道一个事件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及每个结果出现的概率的时候，我们面临着风险。当我们不知道这些结果出现的概率的时候，我们面临着不确定性。

例如，把我们空投到一个从来没听说过的地方，来预测明天的天气，我们面临的是不确定性问题。但是如果天气预报告诉我们明天的降水概率为50%，我们面临的就是个风险问题。^①

三、会计革命：从计量观到信息观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会计学界主要从计量观来认识会计在社会中的作用。这种观念来源于经理层的受托责任。社会认为企业经理层是企业股东、债权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受托人。但是，社会并没有把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经理层受托责任的唯一指标，保全资产同样是经理层受托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种认识下产生了会计的计量观。财务报告的目的是衡量经理层是否尽责地完成了受托责任，尤其是衡量企业的资产、负债和权益。

^① Beaver 教授在其书中可能混淆了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概念，因此读者可以用风险来理解书中所指的不确定性。本导读按照原文继续使用“不确定性”来表达。



计量观同样关注企业的经营业绩，并且认为经营业绩的衡量指标是经济利润 (economic income)。经济利润指的是从期初到期末企业未来现金流现值的变化，而财务报告的重要目的之一即是尽量准确地衡量经济利润。

如果经济利润是能够准确定义的，计量观就不失为财务报告的目标。事实上，如 Beaver 教授在第 1 章中指出，在完美市场/完全市场及无不确定性的假设下，经济利润是准确定义的，它不仅反映了企业本期付出对企业本期现金流的影响，而且反映了对未来现金流的影响，并且，因为市场是完美和完全的，各期现金流之间是可以无成本“交易”的，即预期的现金流都是可以最终实现的。

在这种情况下，以计量观作为财务报告的目标是正确的、没有问题的。

计量观更关注的是过去，是衡量已经发生的企业行为和影响。这与后面讨论的信息观有根本的区别，信息观更关注的是未来，是预测尚未实际发生的企业行为和影响。在计量观下，我们比较不同会计体系或会计处理方法的标准是哪个体系或方法能更好地反映经理层的受托责任，更好地衡量企业的经济利润，例如折旧方法的比较和选择。又如公允价值计量方法，公允价值计量方法无法提供任何新的信息，因为公允价值取自投资者已经观察到的市场价格，所以信息观不可能支持会计准则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方法，但是从计量观的角度，公允价值直接反映了资产的经济利润，是合适的会计处理方法。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是 Beaver 教授所谓的“会计革命”的开端，会计界开始从计量观向信息观转变。这个观念的转变很快体现在了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中。1978 年发布的《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财务会计概念》第 1 号指出：

财务呈报应该为现实或潜在的投资者和债权人提供帮助，帮助他们评估企业未来现金流的金额，时间和不确定性的信息。

之所以发生这次重大的革命，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计量观下的经济利润不是一个能够准确定义的概念。如上所述，经济利润只有在完美市场/完全市场及无不确定性的假设前提下才是准确定义的，而现实的市场，即便是最接近这种理想状态的股票市场，也远远不是完美的和完全的。例如，如果存在卖空限制，我们就很难定义企业所持有的股票投资的经济利润，因为市场是不完全的。其他市场，如固定资产的市场、存货的市场、应收应付账款的市场甚至不存在，更别提完全或完美。在这种计量对象不能准确定义的情况下，用财务呈报来计量这个对象就有很大的问题。

第二，即便经济利润是可以正确确定的，以其为目标的财务呈报也不一定是符合社会利益的。财务报告不仅仅服务于股东，而且服务于很多其他

利益相关者，如债权人、管理层、员工、政府、社会等。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财务呈报有不同的要求，大家对最“优”的财务呈报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而财务呈报需要在利益相关者中取得一定程度的平衡。所以，以经济利润为目标的计量观在现实博弈中不一定能够胜出。这恐怕就是之前的几十年中，在没有竞争观念的前提下，会计学界的讨论并没有使计量观成为无法挑战的美国会计准则制定基础的原因。

信息观下的财务呈报有两层目标。第一，财务呈报为决策者提供信息，帮助投资者根据信息进行相关决策。最重要的体现是在证券市场上，财务呈报提供有关未来现金流的信息，帮助投资者进行投资组合决策。第二，财务报告信息是合约的基础，如债务合约、管理层薪酬合约等。

可以看出，信息观的目标不如计量观宏伟远大。信息观认识到财务报告只是决策者所使用的信息来源之一，因而，财务报告的目的不是完成最高任务（提供所有相关信息），而是在其他信息来源的基础上提供增量价值。

信息观不要求市场是完美的和完全的，不要求无不确定性。实际上，正是因为有不确定性，信息才有价值。信息观认识到决策者面临的决策是困难的，不是确定的，因此，财务报告只要能够帮助投资者更好地评估未来现金流的金额、时间和不确定性，就是有价值的。

信息观和计量观对会计政策有着不同的观念。信息观要求财务报告能够帮助决策者预测未来，因此，对预测未来没有价值的信息没有必要进入财务报告，例如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这与计量观的看法相反。

总之，在 Beaver 教授看来，会计从计量观向信息观的转变是一场革命，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看待会计对社会影响的视角，对会计理论和会计政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四、本书的结构和内容

本书第 1 章描述了之前介绍的 Beaver 教授眼中的会计革命，使读者能很快掌握本书的立场和出发点。本书的其他章节主要介绍会计革命给会计研究和会计实践带来的影响。

在第 2 章中，作者主要介绍信息观产生的背景，以及一旦会计采用了信息观，就必须认识到的信息对财务呈报的影响，以及这种理念的经济后果。该章使读者对信息有了一个比较基本的认识。

该章介绍了两种经济决策的环境：单一决策者环境和多决策者环境。单一决策者环境当然是多决策者环境的简化形式，但是从中可以明晰地分析决策环境和信息的交互作用。



一个决策所涉及的方面基本包括：行为选择 (acts)、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 (states)、每种情况带来的后果 (consequences)、决策者的偏好 (preference)、决策者对未来情况给予的概率判断 (belief)，以及决策者的效用函数 (the objective function)。决策者的目标是使自己的效用函数最大化。一般假设除了概率判断以外，其他的决策因素对决策者来说多是已知的，并且在事实揭示出来之前（即未来变成现实之前）是不变的。所以，在决策过程中，信息改变的是决策者对未来各种情况的相对概率判断，并因之导致决策者行为的改变。这就是信息的作用。

一个信息系统的价值在于它能够通过其产生的信息改变决策者的概率判断，并通过对决策选择的影响增加决策者的效用。财务呈报作为对投资者十分重要的信息系统，其价值是一种财务报告系统提供的信息比另一种与之竞争的财务报告系统提供的信息更能增加投资者的效用。作者在第2章第1节中用一个证券投资的例子简洁清晰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信息观已经对衡量企业的经济利润这个任务本身不感兴趣了，它感兴趣的是如何设计财务报告系统，使会计信息能够为投资者提供可以改变未来预期的信息，虽然这个系统最好能够揭示未来的真实面目，但是，信息观不追求如此宏伟的目标，甚至不要求其信息系统产生的信息是社会效用最大化的。

信息观的理论基础除了上面提到的计量观的不足以外，还包括代理理论 (agency theory)、信息不对称理论 (information asymmetry)，尤其是逆向选择 (adverse selection) 和道德风险 (moral hazard) 问题。作者在第2章中也加以了说明。

现实生活中的市场并非完美市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市场参与者之间所拥有的信息是不一样的，一部分人拥有比另一部分人更多、质量更好的信息。信息不对称首先导致逆向选择问题。信息优势方出于各种原因无法向信息弱势方揭示自己的“本质”，因此信息弱势方只能把所有的信息优势方同等对待（例如二手车市场），这样导致质量高的信息优势方退出交易，市场萎缩甚至消失（市场失灵，Akerlof, 1970）。道德风险问题的产生是因为在一个合同签订以后（如股东和经理层签订的雇用合同），被代理方无法确切知道代理方的行为是否致力于使被代理方的利益最大化，所以不能保证合同的实施。

在这样的市场上，财务报告可以降低或者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社会效益损失，从而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和合同的真正实施。

第2章中介绍了信息观产生的背景和理论基础，其中关于信息的介绍是

普遍性的，从宏观视角阐述了会计革命的轨迹。从第3章开始，本书进入具体的关于这场革命中会计要素的介绍，主要对象是会计盈余。

第3章的题目是“确定性”，实际上本章内容的前提不仅是确定性，而且是完美的和完全的市场。作者在该章中说明了计量观的论据基础，以及说明了在这样的市场上会计没有必要发挥信息提供的作用。

在完美和完全市场及未来确定性的假设下，投资者对未来将要产生的现金流都能预期到，而且这些预期最终会实现，并且投资者都知道这一点。在这样的情况下，投资者决策的基础是确定的未来现金流的现值，而经济利润的定义是确切的。经济利润是会计期间内净现值的变化（不考虑融资活动的影响）。会计盈余的目的是尽可能更加准确地估计经济利润。会计盈余和企业价值之间有一个固定的联系，联系的纽带是折现率。会计盈余是估值的流量概念，而价值则是存量概念。

实际上，我们可以设计这样的会计体系，使会计盈余永远等于经济利润。我们把会计活动简化为了估值活动，会计失去了自身的价值。在这样的计量观下，会计信息系统已经变得无足轻重。^①

第4章是本书的核心，介绍现实市场环境为什么产生了财务呈报的“信息观”，以及“信息观”对财务报告，尤其是对盈余的作用的影响。

该章首先放松了确定性的要求，引入了不确定性，但是保持了完美和完全市场假设。因为未来具有不确定性，所以未来的结果（现金流）就不再为投资者所确知。未来现金流最终实现多少取决于哪种未来情况会变为现实。例如，我们今天看明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在确定性环境下我们知道最终中国经济会增长多少，但是在不确定性环境下明年经济可能增长、持平或衰退，而我们不知道到底哪种情况会出现。不同的情况出现后带来的现金流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可以对每种可能情况给出一个概率判断，这样，我们在决策过程中比较的不是确定的结果，而是多种可能的结果的概率加权平均值（见表4—1）。^② 在现值计算模型中，分子是未来结果的平均值，分母的折现率则不再是无风险利率，而代之以反映未来现金流不确定性的风险折现率。

在确定性环境下，我们可以认为未来和现实是一致的，但是，在不确定性环境下则不然。现实的本期现金流是基于过去预期的本期的多种可能情况之一实现的基础上的，而未来现金流现在是无法确知的，因为如果未来情况

① 这一点对我们思考公允价值计量有一定的启示。公允价值应用扩张的过程必然是会计作用降低的过程。

② 实际上，我们今天的学者绝大部分已经从一开始就接受不确定性假设的教育，恐怕从来没有想到过学术界还曾经从确定性角度出发探讨问题。



A (经济增长) 出现了, 投资者得到的现金流不同于如果没出现的未来情况 B (经济衰退) 出现了的现金流。我们现在只能预测未来现金流的平均值 (预期现金流, *ex ante*), 未来期间的实际现金流 (事后现金流, *ex post*) 将很可能不等于预期现金流。

我们应该可以感觉到, 盈余已经逐渐与价值脱钩。实际盈余不是企业价值的变化, 而预期盈余也不是预期的企业价值的变化。要看到这一点, 只要意识到本期期初企业的价值包含了对所有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的评估, 但是期末企业价值对本期内信息反映的只是其中一种情况 (实现了的情况)。在这种环境下, 认为会计盈余的作用是计量企业价值 (或者是实现受托责任) 的观点已经遇到了重大的理论困难。

在第 4 章的后半部分, 作者放松了完美市场和完全市场的假设, 引入了更加现实的不完美、不完全市场。因此, 市场上有交易成本、税收等市场摩擦 (market friction), 信息不对称性, 逆向选择, 道德风险以及跨期套利等。读者可以参见本导读中关于完美和完全市场的定义。

在不完美和不完全市场上, 价值评估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困难的问题, 甚至有些资产的价值就无法确切定义。例如, 人力资本不一定能够确切定价。在这种情况下, 资产的价格也已经不是一个容易定义的概念了。例如, 投资者之间的偏好和效用函数可能很不一样, 这样, 简单的公司价值最大化都不能成立了。因此, 任何依托公司价值的盈余的概念也是不成立的。会计的计量观进一步陷入困境。

但是, 不完美和不完全市场加上不确定性促成了信息观的兴起, 为财务报告提供了新的生命力。

在信息观下, 会计的作用是改变投资者对未来可能情况的概率判断。我们可以把决策想象成一个动态的、不断趋近终点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任何节点都衍生出若干分支, 像个决策树。决策者从“树根”出发, 每到几个节点就碰到若干“枝杈”, 决策者需要选择其中之一继续走下去, 直至走到“树顶”。可以想象, 决策者达到的“树顶”不一定是“树木”的最高点, 因为可能在之前某个“枝杈”处, 她已经错过了到达最高点的路径。

信息观认为, 财务呈报的作用是在每一个“枝杈”处, 改变投资者如何达到最高点路径的判断。会计盈余之所以能起到改变概率判断的作用, 是因为它和价值的基本元素 (现金流或股利) 有着某种联系, 包括现在盈余和未来盈余的关系、未来盈余和未来股利的关系以及现在盈余和未来股利的关系。至于计量观认为的盈余和经济利润的关系, 已经是第二位的问题了。

至此, Beaver 教授清晰地阐述了从计量观到信息观转变的会计革命的历

程。在第5章中,作者回顾了相关的部分学术研究成果,从实证证据上支持了信息观。在第6章中,作者介绍了市场有效性问题。这个问题对我们评估财务会计与资本市场实证研究的理论贡献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第7章中,作者讨论了从信息观角度如何分析政府对财务呈报的监管问题。这些章节比较容易理解,这里不予赘述。

五、对本书及相关会计实证研究的评述

毫无疑问,《财务呈报:会计革命》一书清晰、精辟地介绍了20世纪60年代前后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会计目标认识的重大改变。信息观成为和计量观竞争的观念,并逐渐成为主流的观念。信息观成为大量财务会计与资本市场研究的基础,在会计准则制定方面,其影响不如在学术界这样彻底。例如,固定资产折旧对信息观来说缺乏信息价值,因为折旧方式和折旧费用已经是“旧闻”而不是“新闻”。但是,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在拥抱信息观的同时,并没有放弃计量观。它们不可能让企业放弃对折旧的呈报。近年来的公允价值计量风潮甚至有向计量观回归的倾向。

会计准则出现向计量观回归的倾向的原因有很多,会计学术界在信息观研究方面的突破是其中一个。

在Beaver(1968)和Ball and Brown(1968)的开创性论文发表40年后的今天,财务会计与资本市场实证研究的主流逐渐陷入发展缓慢、方向不明的状态。这个问题一方面表现在研究题目还局限在本导读第一部分提到的研究领域当中,缺乏研究方向的创新,另一方面表现在即使在这些领域当中,鲜活的、引人入胜的文章也十分罕见。同时,我们还缺乏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基于此,一些美国会计学术界的领导者发出了要重新定义会计学术的内核和外延的呼声(见Joe Demski教授近年来的一些讲话)。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认为至少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会计学博士生教育逐渐自成一体,与经济学等基础学科越来越脱节。会计学研究越来越成为一个封闭的系统。一个典型的美国会计学博士生课程体系虽然也包括微观经济学、统计、计量等课程,但是作为经济学博士生的基础课程,这些课程的内容往往涉及最传统、最基本、历史最悠久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博士生还要在后续课程中学习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前沿,但是会计系往往不要求博士生去选修这些经济学前沿课程,因此,会计学研究吸收经济学发展前沿成果的速度大大降低。第二个原因是美国会计学术界对世界经济发展最新进展的好奇心比较弱,因此研究的视野受到局限,全球化、国际化、经济转轨等过程中的鲜活问题没有引起会计学术界主流的兴趣。我们看到,



美国主流金融学者和金融学期刊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十分关注日本和韩国发展的问题，发表了相当多的研究这两个国家的金融问题的文章，会计学界则没有。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值得警惕的，主流学术杂志的审稿过程和审稿标准同质化，导致创新型的研究缺乏“露面”的机会。

由 Joe Demski 教授等人发起的关于会计学术性的讨论是会计学研究走出现在这种困境的一个良好契机，值得进一步开展下去。否则会计学术研究很难改变目前这种艰难的局面。

最后，我们要提醒读者，本书（第 3 版）出版于 1997 年，因此没有包含最近 10 年来会计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虽然会计学研究存在上面提到的问题，但是近 10 年来还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包括对信息观和计量观的深入研究。读者在阅读本书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阅读近 10 年来发表的较新的文章，对更深刻地理解这场会计革命必然有更多的帮助。

参考文献

1. Akerlof, G. . 1970.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4: 488—500
2. Ball, Ray, and Philip Brown. 1968.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Accounting Income Number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6: 159—78
3. Beaver, Willia. 1968. "Information Content of Annual Earnings Announcement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6: 67—92
4. Hong, Harrison, and Jeremy Stein. 2007. Disagreement and the Stock Marke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1, 109—128
5. Knight, Frank. 1971.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Augustus M Kelley Pubs
6. Miller, E. . 1977. "Risk, Uncertainty and Divergence of Opinion," *Journal of Finance*, 32, 1151—1168
7. Ohlson, J. . 1995. Earnings, Book Values, and Dividends in Equity Valuation.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1: 661—687

Preface

As I indicated in the previous editions, I am indebted to the late Sid Cottle, who coauthored *Security Analysis* with Benjamin Graham and David Dodd, for first suggesting that the changes in perspective regarding financial statements were revolutionary. The revolution began in the mid-1960s and a question arises whether it is still appropriate to refer to an accounting revolution. Although the transition is by no means complete, the conceptual shifts in recent years have been milder.

In discussing this issue with others, some suggested that the series of political events in France that began in 1789 is still called the French Revolution, even though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tic forms of government is largely complete. It refers to a historical period that is dominated by changes in perspective of governance. At the risk of mystifying the younger readers, who have known only the postrevolutionary period, I have decided to still refer to these changes in perspective as an accounting revolution.

Of course, the revolution is not complete, particularly in the regulatory processes for financial reporting. In retrospect, the revolution was much more of an academic revolution and reflected a major shift to an informational perspective accompanied by a substantial explosion of empirical research that adopted an informational perspective. Much of the regulatory rhetoric is still the language of measurement, and recently we have seen an expansion of research that embraces a measurement perspective.

The major changes in this edition are in the last half of Chapter 4 and all of Chapters 5 and 6. Chapter 4 now includes the Feltham–Ohlson framework and discusses key features of financial reporting such as clean surplus, delayed recognition, conservatism, and discretionary accruals. In retrospect, it is striking how much early research and, as a result, the first and second editions were focused on an earnings-



only valuation approach from an informational perspective. The third edition attempts to acknowledge the broader perspective of recent research that incorporates balance sheet as well as earnings variables. Chapter 5 has been updated to reflect recent empirical research that adopts a balance sheet perspective and to discuss the dual book value and earnings valuation studies. Many of these studies adopt a measurement rather than an informational perspective. Chapter 6 has undergone major revisions, largely because of empirical research documenting systematic patterns in security returns, such as the postearnings announcement drift and the forecasting of future returns as a function of the book-to-market ratio.

A major issue in the revision is what recognition to give, if any, to the new millennium. After all, they don't come around very often. I had originally included a lengthy section in Chapter 7 with speculation on financial reporting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 am reminded of reading issues of *Popular Science* in the 1950s, which contained ambitious forecasts of what future technology could bestow on us. One issue and the attendant cover I particularly remember contained the prediction that within 20 years (in other words, the 1970s) every suburban home would have its own personal helicopter. Indeed, some prosperous homes would have more. During the morning rush hour, thousands of helicopters would leave their launch pads in the driveways and fill the skies. Traffic jams in the skies would be a major problem. Well, I guess they are around major airports today, but the prediction of a personal helicopter (or two) in every driveway has hardly come to pass.

In retrospect, I do not want the third edition to suffer the same fate as an issue of *Popular Science* from the 1950s. Therefore, I have decided to keep forecasts for financial reporting for the next millennium to a minimum. The concepts underlying the first and second edition are the main focus of the third edition.

I am indebted to many people who have made this and previous editions possible. Their numbers increase, and there are too many to list them all. A special debt is owed to Chuck Horngren and Joel Demski, my colleagues and friends with whom I have shared the Chicago and Stanford experiences. Chuck is now emeritus and Joel has departed for the frontiers of Connecticut and then Florida. However, my debt to them is undiminished. I am also indebted to my colleagues, my coauthors, and my doctoral students, especially Mary Barth, Wayne Landsman, and Stephen Ryan, who hav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my thinking. I also wish to thank P. J. Boardman of Prentice Hall and Katherine Schipper for their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in undertaking a third edition. I would also like to acknowledge the helpful reviews of Teresa P. Gordon, University of Idaho; Steven R. Jackso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Maine; Frank J. Kopczyński, Plymouth State College; Wayne Landsma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nd James M. Wahle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My assistant, Bryan Brown, was very helpful in preparing many of the new tables, figures, and revised bibliographies.

Most of all, I am indebted, as ever, to my wife, Sue, and to my children, Marie, Sarah, and David, for their love and support.

William H. Beaver